

我在山里教英语

本报记者 杨俊峰

“老师，赵红亮（化名）又闹病了，现在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这是我来到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镇的第二天下午，按照计划，我应该在这里给滦平县第七中学7年级5班的同学讲一堂英语课。但是现在，赵红亮的缺席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

在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主人公孙少安、孙少平因为英语基础太差，最终无缘高等教育。在电影《驴得水》中，所有悲喜剧都是缘于一个子虚乌有的英语老师。看起来，英语似乎是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痛点。

记得小学时学过的一篇名为《小马过河》的课文。面前的河水到底有多深，老黄牛和小松鼠说得对还是不对，还是需要小马自己下水才知道深浅。这一次，我得到这个当一回下乡“小马”的机会，带着紧张期待的心情，去踏这条农村英语教学之河。



图为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虎什哈镇的滦平七中校园。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

英语课，为勇气鼓掌

滦平县第七中学是虎什哈镇上唯一的中学，门前有一条二级公路，路过卡车激起的尘土已经把门口围墙的白瓷砖染成了黄色，不过“滦平县第七中学”的金色招牌依然干净得可以照出人影来。门里一尊寓意科学文化的雕塑底座上，醒目地刻着2个烫金的大字——成功。

1月7日这一天下午第三节课，是我的英语课。对顺利上好这节课我还是有把握的，因为一天之前，我已经治服了班里最调皮的学生之一——赵红亮。见我第一面，他就对我吹牛说“老师我能写200字的英语作文”。然后他就后悔了，因为我真的要求他写，并且让他写好了当堂朗读。

不过听到他被校长带走的消息时，我还是懵了。就在上午，赵红亮还信誓旦旦对我说：“老师我下午会给你一个惊喜。”可惜世事无常，我猜到了开头，却没有猜到这结局。

赵红亮去接受批评了，可是英语课还得继续上。看了一眼台下眼巴巴望着我的同学，我调整了呼吸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单词——topic。

“Hello, everyone, my name is Junfeng Yang, I'm a journalist. Today I'm your English teacher. Now let's have a discussion. Do you know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?”我用中文翻译了一遍，告诉大家今天的课程不是背卷子。我们要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。什么话题呢？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另一个单词——teacher。

我要求大家用英语讲一下自己心中的好老师。“整句说不出的话，说单词也可以。”我环视教室，孩子们都低着头。我试着鼓励了一下：“你可以尽情地犯错，只要你敢说，我就会为你鼓掌。”

短暂的沉默之后，李子临举起了手，接着是吴同利，坐在墙角的朱德润也举起了手，然后是朱思仪，张可欣……气氛活跃起来了。这些平时不怎么张口说英语的孩子，一个一个都举起了手“老师我来！”“老师让我第一个！”……

他们站上讲台，一字一顿地用英语说：谭老师是好老师，因为她温柔；孙老师是好老师，因为他有趣还懂得多；班主任刘老师我们都很喜欢，因为她从来不训斥学生……虽然也会把“非常重要”说成“非常

重要的牙”，虽然也会绕来绕去说“我不喜欢老老师，因为我喜欢年轻老师”，虽然忘了在所有的形容词前加系动词，虽然有时只能站在台上磕巴着蹦单词“好，温柔，有趣”……但是他们都勇敢站出来了，小小的脸庞上满是认真和倔强。

在最后一个演讲的同学下台时，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单词：“courage”、“confidence”，然后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要记住，学习就是这样，只要做到不要怕，相信我可以，你就没有问题。请大家为自己鼓掌。”

来自北大的老师们

1月10日是滦平七中期末考试的日子，现在是复习时段，英语老师谭胜蓝在带着学生们对卷子。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姑娘，这一点从她的发型上就可以看出来——干脆利落的小寸头，如果她不开口说话，很容易被人们当成一个小男生。

谭老师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，领口挂着一抹浅粉色围巾，她讲课时喜欢笑，无论是指点学生错误，还是领读讲题，她都是笑的。在她的讲台上，放着一个签筒，里面是写着所有学生名字的小竹签。每天上课她都要抽签，被抽到的学生要进行一次对话练习，谭老师的手一碰那个签筒，坐在后排的几个学生脖子就会一缩。

孙国轩老师的课就另当别论了。这位201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大男孩，精通汉语和英语，还有古拉丁

语。孙老师甚至还会编程——在他的寝室里，就放着一个可以进行编程的高级鼠标。此时此刻，身穿苏联海军制服大衣的孙老师，正努力招呼着昏昏欲睡的同学们听课。

“张骞出使西域成功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对，他出使大月氏是带回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他的目的是求得大月氏的援助，大月氏没有援助汉朝，所以他没有成功。”孙老师扶了扶眼镜，口气像一个私塾老先生。午后的教室里暖洋洋的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趴在桌上，后排甚至可以听到轻微的鼾声。

这就是在虎什哈支教的年轻北大老师们的日常。谭胜蓝老师今年21岁，孙国轩老师24岁，地理老师刘欣铭、政治老师泽仁拥宗（藏族）和金合子小学的自然老师康超雄都是1994年出生的老师。其中，康超雄从2015年毕业后来到虎什哈支教至今，任教逾1年半，是这里资历最长的老师。

北大学生对虎什哈地区的中小学支教最早开始于2011年，到目前已有400多人来这里支教，支教次数超过900次，短则一个周末长则一个月，没有形成固定的体系。

学生们支教的日常费用是由已经毕业的北大校友出资赞助的。从2014年开始，前来支教的北大学生开始为虎什哈的地方小学和初中举办“夏令营”和“冬令营”活动，针对写作、数学和英语等基础科目对学生进行强化培训，培训都是免费的。在夏令营的培训中，老师们发现这里

的孩子们英语基础比较差，就2014年的夏令营而言，在班上排名前10名的孩子，居然认不出音标。

留不住老师的困境

2016年3月，为了支援当地的基础教育，谭胜蓝等7位北大学生发起了虎什哈实验学校项目。在他们发布的微信教师招募令中，几位北大老师写下了这样一段开篇词：“当地中学师资极度缺乏，初一仅有3名数学教师，两位是生物老师，一位来自小学。”

“这里留不住老师。”康超雄对我说。在他执教的金合子小学里，全校加上康老师自己总共12位老师。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个月，就有3位老师从学校离开。最窘迫时候，一年级和五年级都没有班主任。

而在滦平七中，情况也不乐观。从2010年建校到2016年9月末新校长入职，6年中学校共流失26位老师。学校还有许多特岗教师，与普通教师不同，特岗教师需要在农村地区任教3年以上，通过考核后才能拥有正式编制。在虎什哈镇，新的正式教师编制是不足的，因此，为了转为正式编制，有些任教满3年的特岗教师会选择离开。

“留守儿童有一大批，在我的小学里占30%，一个班40到50人，有10到20人是留守儿童，我曾经负责教过统计，这里一年级留守儿童已经超过50%了。”康超雄对我说。除此之外，事实上单亲的孩子，在一个班里至少有2到3个，他们中的大多数



图为本报记者在滦平七中7年级5班的同学授课。

谭胜蓝摄（人民视觉）



图为金合子小学的学生在塞北学堂里复习功课。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

已经处在放弃学习的状态中。

“我一开始很沮丧，有个孩子跟我说他在校门口开一个小卖铺。”谭胜蓝对我说，“所以他觉得只要学会数学就好了。他的数学确实学得特别好，但是英语就不行。”

虎什哈镇与北京怀柔区和河北承德市的距离不远，因为地处山区，经济条件与大城市差距较大。“在教育条件市场化的情况下，老师们都愿意去工资高待遇好的大城市。大城市的学校，遇到看好的地方老师时，也会高薪抽调。”支教活动的负责人之一田宗阳告诉我，“怀柔汤河口中学6年前曾从滦平县挖走了一个物理老师，滦平县当时物理老师的平均工资是5000元左右，怀柔的学校则开出了1.1万元的工资，并给这位老师分了一套房。”

“对一个有2个孩子的普通农村家庭而言，家里如果出一个大学生，那么这家的这代人可以通过他及时了

的捐款汇总方，负责为老师们提供日常的生活保障并支付工资。作为塞北学堂的新任校长，田宗阳告诉我，“我们的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1.5万元，是本地老师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。”在他看来，要想让顶尖学府的老师们留下来，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现实需求，“有的女生第一次来的时候吃住不方便，也不太适应农村的早厕。后来我们集资建了这个教学基地，解决老师们的起居住宿问题。”

田宗阳说：“我们想给孩子们找到一个吃饭的家伙。”这个本事就是英语。2016年，田宗阳和他的团队定了一个小目标，他们要让已教过的学生在初中毕业时英语水平达到高中水准。“因为乡镇中学普遍缺少好的英语老师，而英语老师在这些地区学校的待遇都不高。如果我们成功了，下一步就是推广到河北、内蒙古、山西的乡镇，这样一来，山区的孩子们就有了为找到好



图为谭胜蓝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。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

解社会信息。”田宗阳说，“如果这个家庭里连续10年都没有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，那他们的信息缺失就是细胞层面的，这比贫穷更可怕。”

从想学英语开始的改变

在虎什哈镇口的一片空地上，坐落着一个由货运集装箱组合而成的小型建筑群。宽敞高大的钢结构大厅，精致的木质地板，24小时供应的地暖……走进门里，你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北京的高级写字楼。

这里是塞北学堂，谭胜蓝等6位老师在虎什哈支教的大本营。2016年7月，塞北学堂成立，滦平县教育局的吴树申局长亲自到现场办公，给学校下批文。县委书记蔡福浩也多次过问塞北学堂的办学事宜，要求为学校解决实际问题。11月初，时任滦平县县长的崔瑞祥带领10多个相关部门，到塞北学堂现场办公，解决学校和地方联合办学的问题。此外，县教育局特批了滦平七中2个班级给北大支教老师，支持他们的工作。“北大学生来这里支持我们的教育工作，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做些工作。希望可以留住他们，好好教教我们的孩子们。”吴树申局长对我说。

新成立的塞北学堂，是北大校友

工作而学习英语的动力，同时也可以帮助当地解决好英语老师紧缺的问题。”

谭胜蓝今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——为了来山里支教，她曾推迟一年入学，孙国轩也要去英国国王学院学习了。他康超雄还在犹豫是否要离开，他也想考研究生，但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些孩子们了。

塞北学堂的事业还在继续。田宗阳说，“我们想做成一个体系——社会捐款加名校学生任教的稳定模式。”

在我的课上，孩子们勇敢而自信的表现就是对他们的最好答复。在孩子们的掌声中，我看了一眼讲台上的两页稿纸，那是一篇200字的自我介绍，赵红亮写的。上午我来学校时他说要给我惊喜，他确实做到了。

谭老师曾对我这样说：“孩子们的想法很多，有想当导演的、想当宇航员的、想当美食家的……还有一个孩子坚定地说要上清华北大。听完他们的话，我好像看到了春天的希望，一片绿色的希望。”是的，希望的种子已经在这里悄悄落地，生根，发芽了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冰

行走峭壁上的极限人生

本报记者 杨俊峰

“当别人问起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，英国探险家乔治·马洛里回答说，‘因为山就在那里’。但这不是我的答案。”在北京市怀柔区的一家陕北面馆里，周鹏用筷子搅了一下碗里的面条说，“我登山，因为我想去登山。”

今年34岁的周鹏是北京“享攀”攀登学校创始人，中国首位“亚洲金冰镐奖”获得者，中国国内顶尖的民间登山运动员之一。

周鹏的眼神清澈明亮，目光中有一种纯粹。他话不多，和人交谈时习惯做一个礼貌微笑的倾听者，但是聊到登山就不同了。说到兴头上，他甚至会激动得绷紧肌肉，眼里

射出兴奋的火花。正如周鹏自己所言，所谓纯粹的喜悦，就是指“一天用多少时间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”。肥大的羽绒服遮住了他结实的肌肉，但是遮不住他粗大且布满老茧的手，特别是指尖。

“看一个人攀岩专不专业要看他手上老茧的位置。”攀岩和攀冰是登山过程中的必备技能。而常年使用这两种技巧的登山运动员，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“山的痕迹”。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登山协会任职的资深登山运动员，周鹏判断登山者攀岩水平的高低有自己的标准，“如果老茧长在指根，说明此人水平一般，因为他只能抓大石块发力。如果一个人指尖老茧很厚，那肯定是高手，因为他主要使用指尖抓取用力。”

1月7日，“2017攀冰世界杯”在北京召开，在决赛现场，主持人向观众介绍周鹏时引发了全场轰动。此时距离周鹏获得第七届亚洲金冰镐奖已经过去5年有余——金冰镐奖是国际登山界的“奥斯卡”，是全球登山界含金量最高的奖项；距离他最好的登山伙伴遇险离世已经过去4年有余；而距离2006年

他攀登卓奥友峰，已经过去了11年的时间。从一个业余爱好者到中国登山界的顶级运动员，攀登过近50座次山峰的周鹏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自己的11年登山生涯——“用心享受攀登，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
对于一个专业登山运动员而言，找到一个合适的搭档，是登顶成功的开始。1984年出生、清华大学毕业、连续三年荣膺国内最佳攀登成就奖的业余登山者和翻译作者严冬冬，曾是周鹏的挚友兼黄金搭档。

2011年10月，周鹏和严冬冬在四川省贡嘎山北麓一个月内完成了勒多漫因、嘉子峰、小贡嘎3座山峰的3条新路线的攀登。“于我而言，这是一个开花的季节，之前对于攀登的所有积累全都绽放了。更让我骄傲的是，我有一个黄金搭档——严冬冬。他说，我们在一起总会创造奇迹。”

登山者们游走于生死的边缘，对他们而言，每一座陡峭的岩壁和冰壁，都有可能是生命的尽头。2012年，周鹏的攀冰生涯遇到了转折点。7月9日，在新疆西天山却勒博斯山的下撤途中，严冬冬不慎坠入暗冰裂缝，尽管周

鹏进行了自己能做的所有救援努力，严冬冬对他的呼叫还是毫无反应。严冬冬就这样把自己留在了祖国的大山里，这一年他28岁。

后来，周鹏在回看自己和严冬冬一起登山视频时，经常独自沉默。“登山本身就是一把把自己扔到危险环境再挣脱出来的过程，如果脱离困境太过轻易，你会觉得不过瘾。可是如果过度了，那那再出来也出不来了。”

周鹏自己也遇到过许多危险。在一次登山过程中，周鹏触发了一场雪崩。在雪崩正下方的他，首当其冲。“当时我就被卷进去了，不停地翻滚下坠。”回忆被雪崩卷走的情景，周鹏笑了，“那个时候真的觉得一切都完了。”

登山过程中要挑战的自然环境是非常危险的，不过周鹏认为，和自然环境的险恶相比，最危险的还是个人的选择。“比如马上要登顶，突然遇到一块20米的大石头，无法设置安全点。此时如果你想登顶，就必须翻越过去，但是没有安全措施保护，风险极高，一个失误就会坠入万丈深渊；或者你就只能下撤，放弃这次登顶。上不上，全看你自己。”

“这种时候我会怎么选呢？”周鹏笑着说，还是那句话，“用心享受，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

图为周鹏在攀冰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尹晓宇